

主义，始终没有动摇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心。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银树清积极响应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拨乱反正重大举措，并以高度的热情和积极务实的态度重新投入到新龙县的革命建设事业当中，并为之献出了毕生的心血。

银树清积极投身于农村改革工作中，与农牧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银树清带领干部群众圆满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牲畜折价到户等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为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1983年12月，任县人大主任、党组书记以来，银树清始终以饱满的情绪，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深入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紧扣全县工作大局，围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要求，依法履职，扎实工作。依法实行任免国家机关人员制度，组织好代表视察，认真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提出许多可操作、有建树的建议意见。积极开展调研，不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认真处理代表和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快了新龙县依法治县的进程。为建立健全人大工作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新龙县两个文明建设的实施，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甘孜州和新龙县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出突出的贡献，曾多次荣获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在新龙县九届一次人代会闭幕会上，银树清被代表们提名连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但银树清为了服从组织的安排，谢绝了人大常委会主任提名。

银树清不幸于新龙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闭幕当晚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1993年3月6日逝世，享年59岁。

扎喜旺徐

扎喜旺徐（1913—2003），男，藏族，1913年农历6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一个藏族贫苦牧民家庭。1935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直接参与创建了党在藏族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甘孜博巴政府”，并担任“甘孜博巴政府”骑兵连连长。同年6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1938年在延安民族学院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藏族中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北局行政处科长，内蒙古盐务局局长，锡察两盟行政委员会处长，兴安省政府财经处处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扎喜旺徐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团长，果洛藏族自治州（后改为自治州）主席；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青海省民族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青海省人民政府委员、副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政法司司长。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扎喜旺徐历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省政法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青海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并为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扎喜旺徐一生立党为公，忠心为国，一心为民，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而又历经坎坷，他为维护

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为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和繁荣昌盛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正如有关部门在评价其一生的业绩时所指出的那样：“扎喜旺徐同志几十年如一日，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为各族人民团结进步事业含辛茹苦，辛勤工作，为发展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贯彻执行爱国民族统一战线作出重要贡献。”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看来他和这些多数战士相处得很融洽。”海伦·斯诺讲的这位红军战士，就是藏族红军战士扎喜旺徐。

扎喜旺徐从7岁开始，给牧主放羊，当长工，受尽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整整过了14年的娃子生活，后来离开老家，到甘孜谋生。当时，也正是国内军阀混战时期。反动军阀竞相在少数民族地区扩张势力范围，设立防区，委任官吏，强征苛捐杂税，滥发纸币，并极力扶持地方反动势力和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扩充团防武装。这些人互相勾结，对各族劳动大众进行残暴的政治压迫和敲骨吸髓的超经济剥削。不仅如此，还不断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各少数民族之间，在少数民族内部，在各个部落之间，制造隔阂，挑动纠纷，煽动武装械斗。更增加了少数民族，尤其是作为少数民族主体的劳苦大众的苦难。

1935年初，徐向前、陈昌浩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孜县。一天，扎喜旺徐跑到县城去看看，在县城门口，站岗的红军士兵走过来同扎喜旺徐搭话，扎喜旺徐听不懂汉话，一个劲地摇头。战士请来翻译，问有什么事？扎喜旺徐回答：“没有什么事，只是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子？和以前的汉兵究竟有什么不同？”正在这个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个领导模样的红军，样子挺和蔼的，问扎喜旺徐是哪个村子里的人？乡亲们的情况如何？跑进深山老林的人，回来没有？牛羊有人照看吗？生活有困难吗？扎喜旺徐一一做了回答。见扎喜旺徐的衣服很破烂，那位红军领导为其送了一件衬衣、一条毛巾、一块肥皂，还给了一个红布条子，让扎喜旺徐挂在胸前。当时扎喜旺徐并不知道那块红布条是“代表证”，上面写着“民族代表”4个字。扎喜旺徐后来才知道，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下，当时正在甘孜县召开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成立苏维埃“博巴政府”，扎喜旺徐所在的村子没有人参加会议，就让扎喜旺徐当了代表。第二天，扎喜旺徐又带着两位老人到县城红军战士见了并立即敬礼，扎喜旺徐感到很奇怪，过去国民党军队，歧视藏族同胞，见了藏民，动辄打骂，称为“蛮子”。可红军对藏民却这么亲切，还敬礼（红军战士向扎喜旺徐致以军礼，给扎喜旺徐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扎喜旺徐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说明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尊重藏族同胞。凭着那个代表证，扎喜旺徐和两位老人进了红军总部一个领导亲切地接见了扎喜旺徐一行，并通过翻译，告诉扎喜旺徐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各族人民谋幸福的，是穷人自己的军队。还讲了许多道理，扎喜旺徐记不住，也理解不了那么多道理，但有一点，给了扎喜旺徐很深的教育和感受，那就是：红军与国民党不一样，对藏民好，对穷人好！后来扎喜旺徐才知道，那位领导就是邵式平，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长。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仿佛看出了扎喜旺徐的心愿，问扎喜旺徐想不想参加红军？扎喜旺徐很爽快地回答说：“愿意”。邵式平对扎喜旺徐说：“回去以后，要把躲出去的乡亲们找回来，告诉乡亲们，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红军有严明的纪律，不准打骂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院。你们亲眼看见了，红军有那么多人马，宁愿露宿草原，也不进驻寺院。想办法告诉乡亲们，不用害怕，赶快回家来，照看好自己的牛羊，安居乐业”。扎喜旺徐按照邵式平布置的任务，到各地说服群众回乡。甘孜县白利寺的主持格达活佛就是在扎喜旺徐的动员和说服下与红军结下深厚情谊的代表

扎喜旺徐四处宣传，动员藏族同胞支援红军的事，很快传遍了甘孜地区，受到红军指战员的鼓励和赞扬。不久，朱德总司令到了甘孜县，亲自到寺院看望格达活佛，还接见了扎喜旺徐和其他一些藏族群众。1936年5月5日，在朱德、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红军将领的亲切指导下，甘孜县成立了“甘孜博巴政府”。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藏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批苏维埃革命政权之一，也是影响最大的苏维埃革命政权。邵式平任博巴政府主席，夏克刀登、格达活佛等人任副主席，扎喜旺徐被任命为骑兵连连长。用扎喜旺徐自己的话说，第一次当上了革命的“官儿”，负责保卫新生的藏族红色政权。1936年5月，红六军团向康南地区的乡城、稻城和巴塘县挺进。在此之前，扎喜旺徐通过瞻化县（今新龙县）的喇嘛寺，给乡城、稻城和巴塘县的寺院及土司、头人写信，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是藏族人民的朋友，希望不要听信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不要与红军为敌。5月14日，红六军团进入乡城、稻城县，受到乡城县最大的桑皮寺僧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并捐献许多食品，慰劳红军。红军纪律严明，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其真诚的态度、高尚的品德和严明的纪律，使喇嘛活佛深受感动。活佛派喇嘛们到各地，通知躲藏在深山老林的群众返回家园，并动员群众把粮食和肉食卖给红军。红军在乡城、稻城县休整了7天。这期间，藏胞支援红军的粮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为红军继续北上，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1936年7月2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到达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孜会师”。红四、红二以及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队伍，先后到达甘孜地区。不久，红四方面军先行北上，邵式平不让扎喜旺徐随部队走，给扎喜旺徐安排了新的任务，为红二方面军过松潘草地准备粮食和其他物资。扎喜旺徐当时没有很高的觉悟和很深的认识，但本能地意识到，为红军筹粮，不是为土司、头人干事，不是为牧主干事。于是，不分白天黑夜，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依靠着红军留下的良好印象和自己的努力，在短短40多天里，筹集到粮食四万六千多斤，此外还有一些酥油和肉类。扎喜旺徐还动员一个寺院，一次赠送青稞5000斤。四方面军走后不久，二方面军也要离开甘孜县，关于去留问题，邵式平征求扎喜旺徐的意见，扎喜旺徐心想：红军一走，藏族地方还是那些土司、头人掌权，穷人还要继续受苦，国民党军队一回来，绝对不会放过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扎喜旺徐向邵

式平表示：愿意跟着红军走。邵式平很高兴，称赞扎喜旺徐觉悟高，有勇气，将其介绍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长征路上，扎喜旺徐一直跟贺龙在一起。作为一个藏族战士，扎喜旺徐适应高原气候，熟悉当地环境，在过雪山、草地时，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起到特殊作用。一次，为了从敌人手里争夺几百只羊，扎喜旺徐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面，把羊群赶了回来。为此，扎喜旺徐也付出了代价，敌人一枪打在扎喜旺徐的左肩上，从前胸穿过去，但奇迹般地没有伤到心脏，没有生命危险。贺龙知道后，亲自前来看望，检查伤口后幽默地说：“你小子命大，子弹再打偏一点，你就去见马克思啰”。走过了雪山、草地这段最艰难的路程，到了岷县境内，扎喜旺徐因吃了生冷的东西，气候不适应，又染上了当地的一种瘟疫，发高烧，几天没有知觉，头发、指甲全部脱落。那次生病的好几个战士，不幸都牺牲了，只有扎喜旺徐一个人活了下来。贺龙再次称赞扎喜旺徐“命大”。扎喜旺徐风趣地对贺龙说：“马克思对我说中国革命没有胜利，藏族人民没有解放，小扎西，我现在还不要你来。”贺龙听了哈哈大笑，用食指轻轻敲打扎喜旺徐的头说：“你这个‘小蛮子’，进步还蛮大的嘛！”

1936年10月，在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人的率领下，二、四方面军先后到达陕北，22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广大藏族人民和各界僧俗人士，为长征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红军在藏族地区、在藏族人民的心田，撒下了革命的种子。1951年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接见准备进军西藏的18军师以上干部时，刘伯承满怀深情地回顾了万里长征的艰难历程。当谈到藏族人民对于长征所作的重要贡献时，刘伯承说：“藏族同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过重要贡献，这一点同志们务必牢记在心，永远也不能忘记”。

扎喜旺徐经常教育年青一代藏族干部：长征精神来源于红军战士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憧憬和执著追求，对革命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吓倒的英雄气概和钢铁意志。红军战士就是依靠这样的信念和意志，化作一股众志成城、无坚不摧的铁流，穿着草鞋，嚼着草根，吞食皮带，咬紧牙关转战南北，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三大主力会师时，已是塞外草衰的时节，红二方面军到达定边以南一个小镇上，根据贺龙的指示，派扎喜旺徐到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贺龙亲切地说：“中央决定举办少数民族班是个重大决策，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从全局着想，下大力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不但是当前斗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今后长远的目标着想。等将来打败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了，全中国解放了，建设少数民族地区，还要依靠你们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作为一个革命战士，要有远大理想，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首先要学好文化知识，提高政治觉悟。”贺龙语重心长的一席话，使扎喜旺徐豁然开朗，深受教育。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每当回想当时的情景，重温贺老总的谆谆教导，扎喜旺徐总是非常激动，扎喜旺徐还经常用贺龙的教导，来教育子女，教育年轻的一代，勉励其努力学习。

革命圣地延安，是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汇聚在宝塔山下，延河之滨。延安，对于扎喜旺徐来说，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既是革命的大熔炉，又是学习政治文化的大学校。扎喜旺徐到达延安中央党校，董必武、谢觉哉、成仿吾三位革命前辈亲自来迎接。董必武详细询问了每个人的情况。学校为这些学生安排好住处，按民族分班编组，藏族班有天宝（桑吉悦希）、郭锐、杨东生（协饶顿珠）、孟泰、罗德干、贺土司、王寿才、扎喜旺徐，一共8个人。后来在少数民族班的基础上，建立延安民族学院，乌兰夫任院长，李维汉等经常来讲课。从那时起，扎喜旺徐就在党的民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李维汉、乌兰夫的直接领导、亲切教导下学习和工作，不断成长进步。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扎喜旺徐和大多数少数民族干部，都在延安学习，一方面是对少数民族干部的

青海解放不久，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作出派工作团，到果洛地区开辟工作的决定。遵照上级指示，1951 年上半年扎喜旺徐以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名义，专门托人给果洛地区几个大部落的头人写信，邀请其前来看看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宁市，并共商建设和发展果洛的大计。各部头人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齐聚西宁市，扎喜旺徐热情接待，并向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也接见了各部头人和代表，大家都感到很满意。同年 12 月，省委领导让扎喜旺徐带着果洛的代表到北京和西安，向中央和西北局汇报工作。12 月 31 日，也就是 1951 年的除夕之夜，是扎喜旺徐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出席中央民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代表，李维汉安排果洛代表团也参加接见。李维汉带着扎喜旺徐去见毛主席，李维汉刚要向毛主席介绍，毛主席带着慈祥的微笑，拉着扎喜旺徐的手亲切地说：“我们在延安就认识，还在一起吃过饭”。毛主席对扎喜旺徐说：“你是我们党培养的第一批藏族干部，你们这批少数民族同志在延安时，学习很刻苦，进步很大。当时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有你们几个藏族红军战士的合影。这本书出版后，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这批少数民族干部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说到这里，毛主席加重语气：“在新中国成立后，你们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不能放松，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努力为本民族多做工作。”当李维汉向毛主席汇报说经与西北局商定，中央决定让扎西旺徐担任果洛工作团团团长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果洛工作团团团长这副担子可是不轻啊！你是藏族，熟悉当地情况，又是老同志，我相信你能把工作做好。”扎喜旺徐受到很大鼓舞，坚定地向主席保证：“回去以后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绝不辜负主席对我的鼓励！”

1952年2月，西北局正式批准组建中共果洛工委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任命扎喜旺徐为团长，马万里任工委书记。7月1日，果洛工作团数百人，包括各个民族成分的干部、战士，在马万里和扎喜旺徐的带领下，向果洛进发。8月4日，果洛全境宣布和平解放，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有一个人伤亡。工作团进驻果洛后，在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的关怀和领导下，坚决执行“更加慎重稳进”的方针，实行“特殊优惠政策”，以“做好工作，站稳脚跟”为总体指导思想，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扎实稳妥地开展两大项基础工作：一是化解矛盾，促进团结；二是诚心服务，赢得人心。由于工作团很好地贯彻执行了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不但使工作团站稳了脚跟，而且很快打开了局面，形势的发展比原来预想的还要好，原来设想将遇到的一些困难，得到比较圆满地解决。整个果洛地区社会稳定，各部落之间消除了历史上造成的一些隔阂和冤家纠纷，团结一致，和谐相处，共同恢复和发展牧业生产。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解放军和果洛人民之间的团结，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为了进一步发展这种大好形势，经西北局和青海省委批准，于1952年12月，组织“果洛各界人士参观团”，由扎喜旺徐任团长，到祖国内地参观访问，同时代表果洛三部落的僧俗人民，向党中央、政务院献旗、致敬。参观团到北京时，受到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和中央统战部、民委负责人的亲切接见。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等领导在听取汇报后，对于果洛地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进一步做好果洛地区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根据上级指示，1953年5月，果洛工委和工作团，决定组成5个分团，分别到各部落访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为在各部落建立基层政权奠定基础。由于各分团很好地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各部落和基层的建政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在果洛地区建立统一的人民政权的条件成熟了，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和政务院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1953年底召开果洛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元旦，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扎喜旺徐当选为第一任主席。扎喜旺徐热爱青海这个美丽的地方，热爱青海的各族人民，愿意把自己的智慧和生命，毫无保留地、心甘情愿地献给这片土地，献给这里的人民。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不管经受什么样的挫折和磨难，遭到什么样的打击和迫害，总是一往无前，不屈不挠，无怨无悔。

1954年9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扎喜旺徐当选为人大代表，与青海省的各族代表一起到北京，参加了这次盛会。同年12月27日，青海省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西宁举行，扎喜旺徐当选为副省长。第二年扎喜旺徐便离开果洛，到省上工作。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全国共有3个藏族代表，即桑吉悦希、扎喜旺徐和钦饶。同年的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这在西藏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中央非常重视，组成以陈毅元帅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扎喜旺徐亦作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跟随陈毅到了拉萨。这是扎喜旺徐第一次到拉萨，会见了西藏的各方面人士，对于藏族的社会历史，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1958—1960年，青海藏区进行民主改革时，省委个别主要领导提出“两步并作一步走”、“一步登天”等错误口号，不顾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在牧区大办人民公社和“集体食堂”，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群众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在这关键时刻，扎喜旺徐不顾个人得失，挺身而出，反对这种错误做法。在农牧业生产方面，省委个别领导大力提倡开荒生产，使青海湖周围大量的环湖牧场遭到严重破坏。扎喜旺徐又提出反对，并说“开荒生产，发展农业，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你们现在开垦的不是荒地，而是水草肥美

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李维汉受到错误批判，不久便离开了领导岗位，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和扎喜旺徐都受到牵连，受到错误批判。1964年，扎喜旺徐再次受到撤销副省长的处分，调离青海，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调到中央民委政法司任司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扎喜旺徐再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走资派”、“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由于扎喜旺徐比别的领导干部多一条“罪行”，多一顶“帽子”，当时被称作“双料黑货”，受到严厉批判，先后被下放到吉林和湖北劳动。1972年，当“四机关”（“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4个机关合并在一起，统一管理，简称“四机关”）的军代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特别问到扎喜旺徐的情况，问扎喜旺徐“解放”没有？军代表谈了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弄清，总理打断军代表的话，明确指示：“扎喜旺徐同志从小参加革命，当红军时连汉话也不会讲，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他怎么可能‘反党’，怎么可能‘背叛祖国’？至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帮助他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加以改正。”这样，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扎喜

旺徐回到北京，重新担任政法司司长。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为了坚持真理，扎喜旺徐虽然多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待遇，历经坎坷和挫折，但是扎喜旺徐始终相信党，坚持党的原则，保持了一个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和情操。1957年7月，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当着各民族代表的面，给予鼓励，总理说：“扎喜旺徐同志是一个向我们党说真话的同志。”陈毅、贺龙、乌兰夫和刘格平也很喜欢扎喜旺徐的这种性格，称赞扎喜旺徐能够“讲实话，讲真话”，“光明正大”。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扎喜旺徐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中央再次派扎喜旺徐到青海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协主席等职务。到青海以后，扎喜旺徐坚决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积极贯彻落实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所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群众最关心、影响最大、同时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即平叛扩大化问题。1981年2月，在中央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精神鼓舞下，扎喜旺徐带着调查材料到北京，抱定不怕再次被打倒的决心，将调查报告报送中央有关部门。3月1日，扎喜旺徐直接给邓小平写信，恳切希望过问这一事情，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批示给胡耀邦。3月12日，在胡耀邦亲自主持下，中央书记处举行第91次会议，专门讨论扎喜旺徐给中央的报告，解决青海的平叛扩大化问题。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明确指出：“扎喜旺徐的信有调查研究、有分析，实事求是。”书记处就如何纠正平叛扩大化问题，作出明确决定。在当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的积极配合下，在李维汉的指导下，这一问题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6月27日，根据中央决定，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释放因1958年参加“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全部在押人员。省公安厅同时宣布，对刑满留场的参叛人员一律送还原籍，另行安置。基本上解决了1958年平叛扩大化造成的错误，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为一大批蒙冤受屈的人昭雪平反。在省委领导下，扎喜旺徐还对牧区在“文化大革命”中错划的阶级成分、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叛国分子”、“分裂主义分子”、“投降主义”的干部群众平了反。

1981年11月，省五届三次人代会议上，扎喜旺徐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3年4月，当选为中共青海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8月，在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扎喜旺徐当选为政协主席。

扎喜旺徐经常教育藏族干部和自己的子女说：“我是一个娃子出身的穷孩子。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就没有我扎喜旺徐的今天。自从参加红军到延安，到全国解放，我是在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在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等党的民族工作战线的老领导的直接教育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扎喜旺徐还满怀深情地说：“回顾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事，唯一的心愿，是希望你们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这是我们党的无价之宝，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2003年10月16日23时，扎喜旺徐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扎喜旺徐的逝世，是党的民族工作的重大损失。扎喜旺徐的一生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一生。扎喜旺徐一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认真负责，讲原则，顾大局，识大体，时时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想着人民群众。扎喜旺徐为人耿直，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团结同志。扎喜旺徐生活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坚持真理，始终保持了一位老党员的高尚品质。

正当高山村人民期待自己的致富带头人在新的世纪里继续带领全村人民奔小康时，2003年8月，小公布因病魔缠身，经县医院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63岁。